

历史的回声：日本赤军形成、发展及解散的历程辨析

王 炜

【摘 要】日本赤军的产生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日本兴起的新左翼运动。该组织在阿拉伯地区形成、发展并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发生关联，因涉嫌参与劫机等一系列恶性事件而被国际社会视为恐怖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日本赤军谋求向政党转型以回归本国，但始终未能成功。2001年，日本赤军宣布解散，其领导人重信房子直至2022年才被释放出狱。从表面上看，日本赤军已无法对日本政治和社会构成根本性冲击。然而，考虑到该组织仍有不少坚定的成员和支持者，加之日本社会内部暗潮涌动，其对日本民众乃至政治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关键词】日本赤军 重信房子 日本政治 人民革命党

【作者简介】王炜，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K3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4) 05 - 0117 - 14

一直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日本赤军及其领导人重信房子的关注较少，总体上呈现两种认识倾向：一种仅对日本赤军的组织性质进行定义而缺少对相关史实的析述，如伍立杨的《赤军及其他》和朱瑾华的《消失的“恐惧”——恐怖组织消亡的若干个案分析》；^①另一种则将日本赤军与赤军派

^① 参见伍立杨：《赤军及其他》，《文史天地》2006年第8期，第59页；朱瑾华：《消失的“恐惧”——恐怖组织消亡的若干个案分析》，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3~27页。

简单混同，如孔军的《日航“淀”号客机历险记——日本赤军劫机投奔朝鲜》。^①

探究日本赤军在其形成、发展及解散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具体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日本政治和社会的走向。作为日本新左翼运动嬗变的结果之一，即便在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总体趋于保守化、国家战略日益右倾化的今天，日本赤军也依然对其本国社会具有一定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分析日本赤军的发展历程，总结其本质特征，以期更加深入地发掘当代日本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

一、同赤军派的渊源导致日本赤军崇尚使用武装暴力

日本赤军与新左翼运动的激进派别赤军派渊源颇深，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组织崇尚使用武装暴力的特性。

（一）主要成员皆出自赤军派

在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日本新左翼运动中，^②各派组织林立。1958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③简称共产同（Bund）。共产同后来发生分裂，部分成员于1969年9月成立赤军派，日本赤军的主要成员皆出自该组织。彼时还是明治大学夜间部学生的重信房子不久后即进入赤军派国际部，在此之前，她曾加入多个学生运动组织，展现出强大的组织能力。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新左翼运动逐渐走向激进和暴力。赤军派先后组织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尤以“大菩萨岭事件”最具代表性。1969年11月，50余名赤军派成员在山梨县甲州市的大菩萨岭进行秘密军事训练，计划袭击并占领首相官邸，因事泄被警方逮捕。赤军派早期提出的“初级阶段起义论”由此宣告破产。此后，为加大对新左翼运动的镇压力度，日本政府根据1952年出台的《破坏活动防止法》逮捕了大批赤军派成员，其中便包括重信房子。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重信房子曾义愤填膺地写道：“这种毫无正当理由的逮捕行为使我更加坚定了参加斗争的决心。”^④

在日本政府加大镇压力度的情况下，部分赤军派成员提出建立“国际根

① 参见孔军：《日航“淀”号客机历险记——日本赤军劫机投奔朝鲜》，《航空世界》2014年第4期，第58～63页。

② 参见〔日〕藏田計成：《新左翼運動全史》，流動出版株式会社1978年版。

③ 参见〔美〕丘琦欣、休斯顿·斯莫尔：《“日本马克思主义”、新左翼运动和历史的辩证法——柄谷行人访谈录》，嵯明亮、张欢欢译，《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4期，第1页。

④ 〔日〕重信房子：《日本赤軍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43页。

据地”的设想。为了在朝鲜建立“国际根据地”，1970年3月31日，9名赤军派成员劫持了日本航空公司“淀”号客机，并于4月3日晚间降落在平壤美林机场。朝鲜政府虽然允许劫机者暂时滞留，但禁止他们与日本国内联系——赤军派在朝鲜建立“国际根据地”的设想落空，日本国内的赤军派也因此受到更加严厉的打击。

“淀”号劫机事件后，赤军派部分成员决定重新选择建立“国际根据地”的合适地点，甚至还曾谋划向美国派遣武装人员发动起义。最终，在同时满足摆脱日本政府镇压、保持相对的人身自由、便于开展“武装斗争”和建设“世界革命”试验场等几项基本条件的前提下，赤军派部分成员将目光投向了中东的巴勒斯坦地区。不久，日后日本赤军的代表人物重信房子、奥平刚士、安田安之和冈本公三等陆续以伪造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地区，^①成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下简称人阵）的志愿者，并成立了“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

（二）基本主张继承自赤军派

日本赤军不仅在组织上与赤军派有密切联系，而且在基本主张方面与赤军派一脉相承。赤军派的基本主张突出表现在以“为日本革命寻求出路”为口号，不断通过暴力行动反抗日本当局。具体而言，赤军派的基本主张包括两方面：其一，强调“武装斗争”，重视以武装暴力的形式开展“具有攻击性的阶级斗争”；其二，强调建立“国际根据地”乃至“世界革命根据地”，^②发展世界赤军，构建新的生产组织，以帝国主义国家为“战场”开展“跨越国境的战斗”。^③不难发现，赤军派的主张过于轻率和激进，一味地宣扬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性，忽视了日本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求，缺少深入的理论思考。

赤军派的基本主张被重信房子等长期奉为圭臬，成为其在阿拉伯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精神支柱。重信房子曾回忆称：“当时的我们心中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梦想着只要牺牲自我、奋不顾身，就可以实现世界革命。”^④

① 重信房子、奥平刚士于1971年2月抵达与巴勒斯坦交界的黎巴嫩，安田安之和冈本公三的抵达时间稍晚，分别是1971年9月和1972年3月。

② 参见〔日〕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編：《世界革命戦争への飛翔》，三一書房1971年版，第265~270页；〔日〕査証編集委員会編：《新編「赤軍」ドキュメント》，新泉社1983年版，第216页。

③ 〔日〕共產主義者同盟赤軍派編：《世界革命戦争への飛翔》，三一書房1971年版，第273页。

④ 〔日〕重信房子：《日本赤軍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39页。

不仅如此，重信房子还对赤军派的基本主张做了补充，为日本赤军设计了“武装斗争”的主要方针。第一，“前线即后方，后方亦前线”，二者相互支援、相互转换。“国际根据地”既是“武装斗争”的前线，也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开展的游击战的后方，反之亦然。第二，注重采取游击战的形式，认为游击战具有世界性的战略地位，是构成日本赤军组织战略的重要环节，只有通过这种目的明确的战斗方式，才能将世界各区域的斗争统一起来。^①

由此可见，日本赤军继承了赤军派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组织运作模式，将建立“国际根据地”看作实现“世界革命”的重要途径，并对游击战推崇备至。这既为此后日本赤军实施一系列武装暴力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在其组织内部强化了相应的心理建设。同时，重信房子等还准备通过日本之外的“武装斗争”领导日本国内革命，初步完成了与日本国内赤军派建立联动关系的规划。

（三）脱离赤军派的前后经过

然而，在巴勒斯坦地区尝试建立“国际根据地”的重信房子等受到日本国内赤军派的冷遇——不仅对重信房子等的主动联络长时间不予回复，而且将他们依附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视为与赤军派对等的、可以用来发动“世界革命”的工具。重信房子等对此感到不满，逐渐萌生了脱离赤军派的想法。

1972年5月30日，3名来自赤军派的人阵志愿者制造了“卢德国际机场扫射事件”（以下简称扫射事件），^②重信房子等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但阿拉伯世界则将他们视作英雄。^③次日，人阵发表声明表示对事件负责，并强调此次行动是由3名日本志愿者实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3名日本志愿者遵照人阵的部署完成了行动，其中一人更是在遗言里对人阵表达了由衷的感谢。^④

作为唯一存活的行动人员，冈本公三在被捕后接受了以色列方面的审讯，他自称是“Red Army”的成员，欧洲和日本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也

① 参见〔日〕重信房子：《日本赤軍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125～129页。

② 奥平刚士、安田安之、冈本公三组成行动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卢德国际机场与以色列军队交火，造成26名平民死亡、70名以上平民受伤。3名日本人中2人当场死亡、1人被捕。

③ 参见〔日〕丸岡修：《リッター闘争の諸疑問に答える》，〔日〕日本赤軍編著：《日本赤軍20年の軌跡》，話の特集株式会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④ 〔日〕重信房子：《日本赤軍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122页。

使用了“Red Star Army”或“Red Army”的名称。1972年6月15日，重信房子等发表《阿拉伯赤军成立声明》，他们以阿拉伯赤军自居，高度肯定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并表示发动扫射事件是为了与人阵携手反抗以色列。

重信房子等自称阿拉伯赤军，意在凸显他们是赤军派建立“世界赤军”计划的一部分——阿拉伯赤军即“世界赤军”派驻阿拉伯地区的分支。只不过国际社会从扫射事件开始，便将重信房子等与来自日本的“Red Army”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是自我定位的阿拉伯赤军，还是外部定义的来自日本的“Red Army”，都在事实上意味着有别于赤军派的日本赤军的诞生。《阿拉伯赤军成立声明》传递给世人的重要信息是：第一，扫射事件是由日本人成立的阿拉伯赤军组织制造的；第二，这个来自日本的“Red Army”组织隶属于人阵，拥有实施武装暴力行动的能力。

进一步而言，重信房子等自称阿拉伯赤军，是为了借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性获得在阿拉伯地区展开活动的内外部条件，尤其是赋予其“武装斗争”合法性。重信房子曾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为中心，对赤军派的“世界革命”理想和建立“国际根据地”的主张做出新的阐释，认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成功地连接起“世界革命”的各个环节，使其所在地区具有作为“世界革命”的“国际根据地”的意义。^①此外，人阵强调以武装暴力手段维持组织的存续、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声称“最好的宣传形式是武装斗争”，^②这些也与重信房子等的理念高度契合。

同时，重信房子等还借公开声明宣示了与日本国内赤军派的决裂。1971年7月，对建立“国际根据地”已失去兴趣的日本国内赤军派联合其他左翼组织成立联合赤军。1972年2月，联合赤军在长野县榛名山区制造“浅间山庄事件”（或称“联合赤军事件”），最终导致3人死亡、27人受伤，引起日本社会的震惊和广泛谴责。联合赤军在该事件中覆灭，日本新左翼运动的正义性也因此受到根本性质疑，相关组织自我标榜的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口号更是完全失去了民众的支持。重信房子等选择在此时与日本国内赤军派（联合赤军）划清界限，既是为了避免受到波及，也是为了利用扫射事件扩大自身影响力。

① 参见〔日〕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2009年版，第84~86页。

② 这句口号出自足立正生、若松孝二导演的纪录片《赤军·P.F.L.P世界战争宣言》（1971年），参见〔日〕木村正俊：《国际革命としてのパレスチナ革命——展開と解体》，《年報政治学》2009年第2号，第65、69页。

二、不稳定的发展状态导致日本赤军彻底走上恐怖主义道路

日本赤军在扫射事件后迅速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并由于自身不稳定的发展状态，在恐怖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

（一）在向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发展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扫射事件为日本赤军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英雄般的评价和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重信房子不仅作为日本赤军的代表参加了人阵的许多重要活动，而且作为人阵政治和外交活动的成员参与了同阿拉伯国家政府、政党的一系列会谈。这令重信房子等备受鼓舞，他们渴望将日本赤军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然而，种种内外部困难很快便摆在日本赤军面前。

1. 迫于形势而主动脱离人阵

1974年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3236号和第3237号决议，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认可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具备联合国代表资格。这意味着巴解及其下属的人阵组织必须放弃劫机等行为，适时调整其斗争方式。可以想见，巴解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他们对斗争方式的调整完全是大势所趋。在此之前，察觉到形势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的重信房子等急迫地寻求扩大日本赤军的规模：一方面，加强与散居在欧洲和阿拉伯地区的日本左翼激进分子的联系；另一方面，向日本青年发出“只需要准备一张机票便可以加入日本赤军”^①的呼吁。同时，为了争取平等合作的地位，重信房子等向人阵领导人提出，希望由来自日本的志愿者建立组织并开展独立活动。重信房子等之所以采取上述措施，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日本赤军开展的武装暴力行动将无法再借助人阵的名义和正义性予以包装。1974年12月，日本赤军最终决定正式脱离人阵——他们声称不再接受人阵的保护和物资供给，也不再听从人阵的指挥，将与人阵在地位对等的前提下确定共同的斗争原则。

2. 组织结构与成员心态暴露出脆弱性

日本赤军内部的脆弱性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日本赤军始终未能建立稳定、有效的组织结构。1974年初，重信房子等试图组建以分布在各地的联络站为中心、由个人和小群体构成的松散联合体式的政党，从而加强人阵组织内日本志愿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计划在组织内部不设中央和领导

^①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2009年版，第156页。

人，而以各地联络站的独立活动为第一位，确保每个联络站均拥有现场决定权。然而，到了1974年底，重信房子等又决定放弃建立联合体式政党的构想，不再执着于尽可能将“革命”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而希望立足于现有条件建设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重信房子在日本赤军内部设立了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具有过渡性质的机构，并亲自担任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不过，这些所谓的委员会很可能是有名无实的，有的委员会甚至只有1名成员。

其二，部分日本赤军成员对自身行为的正义性产生怀疑。1977年9月底至10月初，日本赤军制造了“达卡日航飞机劫持事件”。劫机者曾对机上日本乘客进行问卷调查，收到许多批判性意见，其中包括：日本赤军的“斗争方式”虽然在阿拉伯地区可行，但在日本是行不通的；虽然日本必须进行变革，但日本赤军的这种方式不会得到民众拥护。日本赤军内部为此产生分歧，有人甚至提出“劫机行为不得人心，不应该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①可见，虽然重信房子等试图通过制造劫机事件维系日本赤军的存续，但有的成员并不赞成实施此类血腥暴力的恐怖行动，更遑论认可其正义性。在自我怀疑中，不少日本赤军成员对组织和个人的前途感到迷茫。加之随后各国加大了机场安检的强度，使劫机行动的难度陡然提升，日本赤军不得不宣布放弃武装劫持飞机等“斗争方式”。

其三，日本赤军成员在被捕后往往供认不讳。1974年7月26日，1名日本赤军成员在巴黎奥利机场被捕，他在审讯中供述了其他参与行动的同伙姓名以及重信房子系日本赤军领导人等信息。这份证词在日后审判重信房子的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成为检方在法庭上提交的重要证据。1975年3月，2名日本赤军成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被捕，他们被遣送回日本后也向警方供述了许多关于日本赤军的信息。这些事实或可从侧面证明，彼时日本赤军成员的忠诚度在总体上已大不如前。

（二）从陷入恶性循环到沦为众矢之的

重信房子等虽汲汲于将日本赤军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但采取的手段有如饮鸩止渴，致使日本赤军陷入不断制造恐怖事件的恶性循环，成为各国政府闻之色变的恐怖组织。

1. 以制造恐怖事件为组织发展的原动力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决定对以美国为首的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1974年1月31日，为了阻止新加坡向南越等“不友好”国家供应燃油，2名日本赤军成员与2

^①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軍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231页。

名人阵成员制造了“新加坡事件”，他们袭击了位于新加坡毛广岛的壳牌炼油厂，并劫持了“拉裕”号驳船。同年2月6日，日本赤军成员又冲进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将大使扣为人质，制造了“占领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事件”。此举旨在呼应“新加坡事件”，最终迫使日本政府做出了让步。重信房子等认为，这两次行动均取得了重大胜利，日本赤军已完全可以同其他组织展开平等的合作。此后，重信房子等不仅将上述行动视为开展“游击战”的成功范例，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将日本赤军建设为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的信心。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日本赤军利用分布在欧洲等地的联络站制造了多起恐怖事件，这无疑是该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的具体表现。如果想成为真正的独立组织，就要提升影响力、扩大规模、筹集更多经费。而对日本赤军来说，要满足这些需求，唯有通过劫机等手段要挟涉事国家释放相关人员并支付赔偿金，但这只会招致各国政府更加严厉的打击。在此种恶性循环中，日本赤军的处境日益窘迫。

为了扩大影响力，日本赤军积极招募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泰国等亚洲国家的留学生，计划在棉兰老岛和东帝汶建立“解放广播电台”，并在船只上设立移动电台。为了筹集建设电台所需的经费，日本赤军精心策划了“本厄行动”。然而，在行动开始之前，1名日本赤军成员于1974年7月26日在巴黎奥利机场被捕，导致许多与日本赤军相关的人员被捕或被欧洲各国驱逐出境。受此事件影响，另有一些旅居欧洲的日本左翼人士因被怀疑与日本赤军有关而无法回国或前往其他国家，只能赶赴阿拉伯地区与重信房子等会合。日本赤军的规模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以至于出现经费紧张的情况。

面对财政困难，重信房子等决定同样以武装暴力手段解决，这显然又是一种恶性循环。1974年9月13日，日本赤军制造了“海牙事件”。1975年8月4日，为营救1975年3月被瑞典政府逮捕并遣送回日本的2名成员，日本赤军制造了“吉隆坡事件”。1977年9月28日，日本赤军又制造了“日本航空472号班机劫机事件”。

以上几次行动的得逞刺激了重信房子等的野心，他们更加相信武装暴力手段不仅能解决现实难题，而且对实现其战略目标——使日本赤军成为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多有助益。然而，在国际社会看来，日本赤军实为一再制造劫机等恐怖事件的惯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际刑警组织先后对一批激进运动的组织者发出通缉，其中便包括不少日本赤军的成员。

2. 成为各国政府重点打击的恐怖组织

20世纪80年代初，出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需要，巴解宣布

禁止日本赤军继续在阿拉伯地区进行公开活动。在此之前，日本和欧美等国便已提升了对日本赤军的通缉级别，将包括重信房子在内的多名日本赤军成员列入通缉名单。例如，荷兰政府在“海牙事件”后即对重信房子发出通缉令。在各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日本赤军成员不断落网。1976年9月23日，日本赤军的重要成员日高敏彦与奥平纯三在约旦被捕；1987年，另一位日本赤军的骨干丸冈修被捕；1988年，泉水博等成员相继被捕，另有多名成员主动向日本政府自首。1988年，意大利政府缺席审判了日本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和奥平纯三，并将二人列入全球通缉名单。此后，从1995年5月至1997年11月，日本赤军成员接连在罗马尼亚、秘鲁、玻利维亚等国被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9月，城崎勉在尼泊尔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逮捕，随后移解至美国，因涉嫌参与“雅加达事件”被判处30年监禁。

美国政府将日本赤军视为恐怖组织的代表，多次警告阿拉伯地区各国政府不要给日本赤军提供任何援助。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日本赤军与巴解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多裂痕。当时，巴解的主流派更倾向于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希望通过政治谈判实现民族独立，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因此，他们放弃了之前通过日本赤军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的做法，转而寻求与日本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77年，巴解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办事处。1981年10月，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首次访问日本，积极发展与日本政府的关系。通过巴解驻东京办事处，日本政府也与阿拉伯地区各国政府建立了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以向有关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为条件，要求对方逮捕日本赤军成员并引渡到日本。1996年，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访问日本并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黎方同意逮捕日本赤军成员并将他们遣送回日本，以获取日方的经济援助。此后，日本赤军成员在黎巴嫩境内不断被逮捕和判决。1997年2月15日，日本赤军在贝鲁特的10个活动据点同时遭到黎巴嫩政府军袭击，5名日本赤军成员被逮捕、起诉。

综上所述，日本赤军先是迫于形势而脱离人阵，致使其武装暴力行动从此失去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赋予的神圣光环；之后又不断制造恐怖事件，以至于受到各国政府的重点打击，成为巴解不折不扣的负面资产。不难发现，即便在日本赤军最早建立“国际根据地”的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的生存空间也已逐渐丧失。

三、政治转型受挫导致日本赤军形式上的解散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埃及正式承认以色列、伊朗爆发伊斯兰革

命，阿拉伯地区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赤军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既要应对外部冲击，又要处理内部日益尖锐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日本赤军试图回归本国，通过向政党转型获得合法参与政治的权利。然而，这种努力并未奏效。

（一）为政治转型所做的铺垫

日本赤军为回归本国并参与政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做了不少铺垫，其重点在于吸引和拉拢日本国内的左翼组织和民众。

1. 提出建立国际革命委员会的构想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赤军虽然对自身的“斗争方式”有所动摇，但依然坚持其关于“世界革命”的理想，主张将世界各地的人民和“战场”都统一起来，粉碎敌人的“和平共存路线”，同时加强地下隐蔽战线的活动，以推动“世界革命”的实现。^①在1975年5月30日发布的声明中，重信房子等首次提出建立国际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他们认为各国各民族人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应跨越国家的限制，共同实现“世界革命”。在革命过渡时期，武装力量首先要在一个国家内部形成统一阵线，然后逐渐发展为更广大区域内的统一阵线，继而发展为国际统一阵线，以壮大革命的主体力量，最终建立包含国际革命委员会、亚洲革命委员会和日本革命委员会三个层次的统一阵线。^②重信房子等还呼吁日本国内的左翼组织以“世界革命”为目标，掀起有组织的“暴力革命”，并成立作为国际革命委员会成员的日本革命委员会。

2. 加强与日本国内左翼组织和民众的联系

为了向国际社会宣传其观点和主张，日本赤军发行了英文宣传册以及 *Japan Today* 等出版物，又从1981年3月起发行英文月刊 *Solidarity*（1984年更名为 *Political Review*）。同时，重信房子出版了《为了团结——日本赤军概要》等书，^③加强了与日本国内的一些左翼组织和人士的联系。日本赤军还定期向日本国内发行其机关刊物《人民通信》及其编辑的资讯类刊物《中东报道》，向日本民众介绍国际时事和有关巴勒斯坦的信息。这些出版物不仅使日本赤军得以向日本国内民众传递政治主张，而且有助于他们与日本国内的左翼组织保持联系。

① 参见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2009年版，第201页。

② 参见 [日] 日本赤军：《プロレタリア国際主義と組織された暴力万歳！世界革命統一戦線日本協議会と組織せよ！（一九七五年五月三〇日）》，[日] 日本赤军编著：《日本赤军20年の軌跡》，話の特集株式会社1993年版，第204~210页。

③ 参见 [日] 日角八十治编集：《団結をめざして——日本赤軍の総括》，人民新闻社出版部1978年版。

此外，重信房子等还通过不断参加活动宣传其政治理念，以期提升日本赤军在其本国的影响力。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迎合日本民众的喜好，他们甚至一反常态，提出“反核·和平·人权”等口号。^①

（二）转型为人民革命党的计划落空

日本的新左翼运动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便在有关“阶级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复争论中裹足不前，逐渐式微。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一跃成为日本新左翼运动关注的焦点。重信房子等则不然，他们仍旧秉持不少固有的观念，认为现实中的日本政治严格遵循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并断言未来在日本各地一定会发生多种形式的反抗运动。^②

为了在前文提及的日本革命委员会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赤军一度计划利用其在巴勒斯坦地区积累的“斗争经验”，在日本国内建立作为“革命母体”的组织。1976 年，重信房子等提出将日本赤军发展为政党的构想，表示要借助日本人民的力量，使日本赤军成为日本革命的领导主体。^③ 20 世纪 70 年代末，日本赤军还对此前奉行的“武装斗争”路线进行了反思，认为在其背后作祟的是“拿人民作盾牌的思想”。然而，重信房子等并未公开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只是表示“不再进行脱离人民的战斗”。^④

1990 年，重信房子等提出开创“人民革命的新时代”，旨在将日本赤军正式地改造为政党。1991 年夏，日本赤军在戈兰高地召开会议，宣布建立人民革命党，^⑤ 并发布《人民革命党纲领草案》。^⑥ 按照重信房子的构想，人民革命党建党的关键是在日本各地组建“地区党”。在此基础上，由日本赤军代表“人民”掌握权力，通过发动社会运动建立基于人民自治、自决和自立的区域性阵地。重信房子等计划于 20 世纪 90 年代完成在日本建设革

① 参见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 2009 年版，第 282 页。

② 参见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 2009 年版，第 283 页。

③ 参见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 2009 年版，第 218 页。

④ 参见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 2009 年版，第 231 页。

⑤ 参见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 2009 年版，第 408 页。

⑥ 参见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 2009 年版，第 401 页。

命主体力量的工作，并用大约10年时间做好各方面准备，以保证日本赤军在进入21世纪时拥有在战略上领导革命的能力。^①

在重信房子等看来，日本赤军向人民革命党的转型当仅限于日本境内，在日本境外，他们仍会以日本赤军的名义开展活动。实际上，重信房子等长期身处日本境外，并不具备在日本发展政党政治的客观条件，正如重信房子总结的那样：“由于国内的斗争环境并不成熟，当时的我们只能非常有限地依靠境外的国际合作和斗争经验，开始作为政党的发展历程。”^②况且，日本赤军本就是一个内部组织松散的激进分子的小团体，这决定了其转型之路必然异常坎坷。随着成员数量的不断减少，直到重信房子入狱时，日本赤军向人民革命党的转型仍然只停留在构想阶段。

（三）试图以形式上的解散推动组织的合法化

2000年11月8日，重信房子以被捕的形式“回归”日本。与此同时，一些与她有关的人员也遭到日本政府的搜查乃至逮捕。重信房子似乎对自身被捕和日本赤军行将解散早有准备，因而在被捕后称：“今后我不再躲藏了。”^③

笔者认为，重信房子试图通过在形式上解散日本赤军的手段推动其转型为合法的政治组织。2001年4月10日，在押期间的重信房子代表日本赤军向支持者们发布了《为了追求公正和正义，我们将携手前行》的公告性文章，^④正式宣布日本赤军解散。同年4月14日，重信房子在《日本赤军解散宣言》中再次以组织的名义宣布了这一决定。^⑤

在《日本赤军解散宣言》中，重信房子依然煞费苦心地为日本赤军的暴力行为辩护，只不过为了对日本社会和民众有所交代，她也向无辜的受害者表达了歉意。重信房子还明确提出，未来要在继承过去经验的基础上，采取适合日本社会的方式开展合法、公开的“斗争”，以实现其心目中的正

① 参见〔日〕重信房子：《日本赤軍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407页。

② 〔日〕重信房子：《日本赤軍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400页。

③ 《「今後は逃げも隠れもしない」重信房子容疑者が本紙に手紙》，《朝日新聞》2000年11月29日，夕刊。

④ 参见〔日〕重信房子：《公正と正義を求めて、ともに進みます（二〇〇一年四月一〇日）》，《人民新聞》第1073号。

⑤ 参见〔日〕重信房子：《日本赤軍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書房新社2009年版，第456~460页。现有资料显示，《日本赤军解散宣言》又称《日本赤军解散声明》，参见〔日〕重信房子：《公判意見陳述/日本赤軍解散声明/パレスチナ諸団体関連資料》，《情況・第三期：変革のための総合誌》第2卷第5号，2001年6月，第135~137页。

义目标：

我的同志们将继续致力于改造世界的斗争。我们将充分借鉴在过去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合作经验，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法、公开、国际团结的斗争方式在日本开展活动。我们要与日本乃至全世界所有努力以微小的力量改变世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以日本为起点改变整个世界。^①

重信房子公开宣布解散日本赤军，意在削弱日本政府大范围打击日本赤军及相关人士的正当性，并改善日本赤军的形象，以期为之后开展合法活动做好必要的铺垫。同时，重信房子主动宣布放弃“武装斗争”，也是在利用其成为新闻焦点的机会，向日本社会和民众表达洗心革面的决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重信房子宣布日本赤军解散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动该组织实现其开展合法活动的目标。

四、结语

尽管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重信房子等就声称日本赤军已不再将“武装斗争”置于最高地位，至 20 世纪 90 年代又欲把日本赤军改造为人民革命党，誓将“武装斗争”彻底转变为“政治斗争”，但是口头宣示是苍白而无力的。在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环境中，“武装斗争”几乎是日本赤军的唯一选择，这对其后来的政治思维造成了深刻影响。重信房子等无视日本赤军在阿拉伯地区得以长期存续的特殊背景，反而幻想将他们在当地活动的经验带回日本，开展地方保卫城市的“斗争”。殊不知在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当代日本社会，民众的思维方式已变得更加多样化，即便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各种问题，民众也不愿寄希望于重信房子等鼓吹的所谓“革命”。

从曾经活跃于阿拉伯地区的日本赤军到试图回归日本的人民革命党，重信房子等虽然自认为日本赤军已经在向政党转型，但该组织集碎片化政治宣传和极端行为于一体的过往仍令人心有余悸。在现实中，日本赤军既无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也未就日本现行社会制度提出有效的改革方针，故在当代日本社会不具备广泛代表性，只能以左翼极端团体或“闪党”的特殊形式出现。^②至少在目前看来，日本赤军尚无可能成为日本政坛上真正的政党。

① [日] 重信房子：《日本赤军私史：パレスチナと共に》，河出书房新社 2009 年版，第 458 页。

② 参见 [英] 卢克·马奇：《当代欧洲的极左翼政党：从马克思主义到主流》，吕楠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 年第 11 期，第 35 页。

然而，日本赤军依然被视为一种未来可能浮出水面的社会意识的代表。^①当前日本的新左翼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去极端化倾向，很多曾经参与学生运动的知名人士，如寺山修司、唐十郎等，都从政治领域转战文化领域。诚然，日本赤军（也包括其他极端左翼团体）早已不具备活跃于日本乃至世界的基本条件，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散。一方面，该组织的部分核心成员依然健在；另一方面，他们造成的社会震荡余波犹存。^②更重要的是，某些“当事人”和政治势力^③仍希望通过日本赤军过去创造的巨大影响力扶持新的力量，从而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中延续一抹独特的色彩。

这种可能性能否成为社会现实，取决于日本社会是否提供适当土壤。自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的稳定性受到就业和次贷危机等因素的一再冲击。在此背景下，曾被奉为左翼运动启蒙读物的《蟹工船》一度热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日本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研究中的关注度也有所提升，^④这些现象表明日本民众的左翼意识正在缓慢复苏。因此，以日本赤军为代表的力量能否消除过去的负面形象并受到日本民众信任，能否提出与日本民众呼声相契合的政治主张并取得广泛支持，皆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2022年6月，时任日本警察厅厅长中村格指出：“日本赤军虽然已经宣布解散，但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解散，其作为恐怖组织的危险性并没有消失。”见《日本赤軍の解散は形だけ》，《朝日新聞》2022年6月3日，朝刊。

② 2013年1月，铃木邦男在其文章《革命的季节：来自巴勒斯坦战场》中将重信房子比作日本电视连续剧《八重之樱》的主角山本八重——一位乱世中的女英豪，时任以色列驻日大使尼西姆·本·希特里特对此深感不满，专门撰文对日本媒体加以批评。参见《駐日イスラエル大使から》，《朝日新聞》2013年2月11日，週刊。

③ 如日本新右翼团体一水会等。

④ 参见〔日〕小堀真裕：《当今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运动——迟来的“再分配”政治的走向》，张俊跃译，《学海》2011年第2期，第156~157页。